

洋奴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从张之洞的洋务活动看洋奴哲学的反动实质

大冶钢厂工人理论组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大批判组

张之洞是清朝末年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的洋务派大官僚。他从事洋务活动二十余年，狂热地鼓吹和推行洋奴哲学，对洋人、洋货、洋技术顶礼膜拜，赞不绝口。什么洋人“确有阅历”、“学精名著”呀；什么洋货“穷极精巧”，洋法“极其精美”，中国“岂敢谓遽造精微”呀，等等。他办实业，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洋务”，“购器雇匠，悉资外洋”。张之洞搞的是洋奴哲学，挂的却是爱国主义招牌。他说，这样办的工厂能“抵制外洋”，“兴地利，富民生”，“利国利民”。洋奴哲学真是“中国自强要政”、“富强之至计”么？否。“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张之洞办洋务、搞“实业”的历史，彻底揭露、批判了他所鼓吹和推行的洋奴哲学的反动实质。

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路线

帝国主义“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它们在经济技术方面对中国的所谓“援助”，不会违背它们的这种本性。洋奴哲学决不是什么能“抵制外洋”、“利国”“富民”的爱国主义路线，而是“利”帝国主义之“国”，“富”外国资产阶级之“民”，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路线。

借技术“援助”为名，行控制企业之实，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掠夺的重要手段之一。张之洞推行洋奴哲学，依赖洋人办企业，正是把命运系在帝国主义的腰带上，一切都得听从帝国主义的安排。洋匠不到，要“停工待匠”；洋人不给设计图纸，得“停工待图”；少了机器零件，也需停工待器。不仅如此，那些被张之洞用“优薪”请来的洋匠，还利用张之洞在技术上对他们的依赖，“独断独行”，“一切厂务不与驻厂委员相商”，“稍不如意，即以停工挟制”。张之洞既把技术大权交给洋人，整个企业的管理大权也就不能不一同奉送。在张之洞一伙办的工厂里，所有生产、计划、财务，直至用人之事，都与“顾问协议而实行”，甚至干脆“听其主持，不掣其肘”。

倾销商品，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掠夺的另一重要手段。张之洞办实业，从机器到螺丝钉，从“铁件”到“火泥”，所有一切设备器材“无非来自外洋”，正是为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效劳。张之洞不惜重金购来的那些所谓“穷极精巧”的洋器，其实是帝国主义为转

嫁经济危机向外倾销的破烂货。机炉“初经运动，必有生涩松脱走火漏气之处”；吊车试用，几使机炉“倾覆”；锅炉和鼓风机，“徒耗巨款，受害无穷”。

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掠夺的又一重要手段。张之洞依赖洋人办实业，投资“累增累绌”，以至“洋债必不能不借”。对于借洋债，张之洞自欺欺人，说什么“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帝国主义的贷款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张之洞及其后继者盛宣怀向帝国主义借债，就是以企业现有的及将来扩建的一切设备作担保。结果，把京汉铁路抵押给了比利时，也使当时中国唯一的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向帝国主义借债，实际上就是出卖中国的工矿企业。

搞洋奴哲学，最终必然出卖整个国民经济的独立，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综合起来分析，张之洞等洋务派头目所办的实业有这样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一个个工厂企业与外国垄断资本有直接联系，被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第二，这些实业主要属于三个部门，即燃料和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军火工业。此外，还有一些轻工业。这样一种经济结构的形成，一方面是清王朝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另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办原材料工业，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需要。张之洞办的大冶铁矿，主要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廉价提供优质铁矿石。这个矿在其开办初期，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七年，输往日本的矿石占该矿同期产量的52%，而价格则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其后，这个矿连同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一起，竟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原料基地。铁路是帝国主义“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进行压迫的工具”。军火工业则是帝国主义用以帮助清王朝镇压人民革命的手段。这两个特点表明，张之洞一伙推行洋奴哲学，办的完全是从属于帝国主义的实业，并且加深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

政治独立是经济独立的前提，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没有政治独立就没有经济独立，而出卖了经济独立，也必然要出卖政治独立。张之洞在湖北办实业，主要是依赖英、德，向它们购洋器，借洋钱。因而力主“固英亲德”，把华中一带变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张之洞还主张，东北地区“既许各国人杂居兴利”，就必须“大改法制，参用客卿”，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列强共管东北的计划，并推广全国。张之洞和曾国藩、李鸿章这伙洋务派头目既是推行洋奴哲学的狂徒，又是投降卖国的老手，是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要实现中国的自强和富裕，必须首先解决这种主要矛盾，并且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别的途径是没有的。张之洞和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对内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对外投降卖国，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们在经济方面所推行的洋奴哲学，是由这条反动政治路线所决定的。

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来不拒绝外援，从来不拒绝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别的国家互通有无，从来不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问题在于把立足点放在什么基础上。坚持自力更生，才能维护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爱国主义；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起发达的民族经济。如果把立足点放在依赖洋人的基础上，那就是卖国主义。不论自觉与否，它都是引狼入室，由经济技术上依赖帝国主义开始，以变本国经济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出卖经济和政治的独

立告终。张之洞和曾国藩、李鸿章崇洋媚外，推行洋奴哲学，大搞洋务运动，就是这种卖国主义的典型。

洋奴哲学——对群众实行洋大人专政的反动路线

洋奴哲学，它同时又是一条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帝国主义洋大人专政，窒息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反动路线。

张之洞一方面把洋大人捧到天上，吹嘘他们有通天本领；另一方面则把中国人民踩在脚下，开口闭口，都称中国人民为“愚民”、“愚夫”，咒骂“华民又无远志”，“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匠役懒惰”。张之洞宣扬这种中国人民不如洋人的反动谬论的目的，无非是妄图证明所谓脑袋“特别灵”的洋大人是当然的统治者，中国人民天生的只能受奴役。

正是按照这种中国人不如洋人的谬论，张之洞训练军队，“全军统带”、“营官哨官，均以洋将弁为之”；开办工厂，都请洋人当“顾问”，请洋人管技术，请“洋人领首作工”，即使出洋学习过的中国工匠，也只能“付之”。张之洞丧心病狂地将大权“悉以委之”洋人，洋人可以“独断独行”，连张之洞一类的“高等华人”也要“听其主持，不掣其肘”，当然更不用说一般中国工人了。洋大人把白的说成黑的，中国工人就不能把白的说成白的。

按照这种中国人不如洋人的谬论，洋人写的书本，订的条条框框，被奉为金科玉律，张之洞下令“一一照办”。中国人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只能在洋条条、洋框框内打转转，不能有丝毫改动。

所谓“洋大人”有通天本领，中国人愚蠢懒惰，中国人不如洋人，完全是一种洋奴才的胡说。

那些被张之洞当作“上等良师”请来的洋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就以他为创办汉阳铁厂所请的那些洋匠来说，他们不仅不是什么“上等良师”，而且有的是盗窃中国经济情报，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特务；有的实际上是外国资本家的商品推销员，“此一种机器不甚灵动，则洋匠必另行购一机器以救之”，而绝不设法修理改进；有的技术极其低劣，结果，煤矿“已费人工机器之力，煤层忽然脱节中断”；有的更是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汗，无所事事，“终日酣嬉”，或者装病偷闲，游荡玩乐，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劳动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以刻苦勤劳著称于世。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近代中国生产停滞，技术落后，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绝不能归咎于中国劳动人民。即使在中国近代，也闪烁过中国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火花，表现过中国劳动人民敢于向洋权威挑战的伟大气概。中国工人多次指出过洋人设计上的错误，解决过洋人没能解决的难题。一八八五年，正是张之洞一伙极力推行洋奴哲学之时，江南制造局一个中国工人指出一艘洋人设计的铁甲兵轮龙骨和舵不合格，说明这样造出来的船必然行驶迟缓，不能掉头。这个局的总办却厉声斥责说：“洋人设计的图样会错吗？难道你比洋人还高明？”船成后，果如中国工人所说，不得不按他的意见加以改造。一九二一年，在张之洞、盛宣怀创办的大冶铁厂，建造一个水塔，中国工人同样指出过“顾问”兼总工程师日本人大岛的设计错误，由于洋奴哲学扼杀了中国工人的意见，完工后，水塔倒塌，造成严重事故。

解放后，中国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象火山爆发一样地迸发出来。就拿大冶钢厂

(它的前身就是大冶铁厂)来说,工人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自力更生,敢想敢干,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在一堆废墟上建成了现代化钢铁企业,而且敢于打破洋框框,大力开展技术革新,不断改进生产设备,创造先进的生产工艺,使这个厂的面貌日新月异。对比大冶钢厂的现在和过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前依赖洋人搞了几十年才有一个一吨半小转炉、一座高炉、两台小轧钢机。现在坚持自力更生,建设了炼钢、轧钢、锻钢、热处理、耐火材料等成套设备;解放前只能生产六种钢,现在增加到近千种,并且能够炼出多种洋专家断言不能炼出的优质“争气钢”;解放前五十九年才生产了二十五万多吨钢铁,现在一年的产量就可超过。这种铁的事实,更是彻底地驳斥了张之洞所谓中国人不如洋人的洋奴谬论。

洋奴哲学——地主买办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洋奴哲学,是地主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殖民奴化思想和孔孟之道相结合的产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意识形态。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革命运动此伏彼起。农民群众的革命,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杀官夺城,贬儒捣孔,横扫半个中国,给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反动的地主阶级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厉害百倍。**“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张之洞公开叫嚷:“中国之患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他认贼作父,恬不知耻地声称,外国侵略者瓜分了中国,

“仍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因此,他们决心遵循孔家店关于“忠信笃敬”以及“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教,投降卖国,**“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妄图依靠洋主子的**“坚船利炮”“钳制”**国内革命力量,镇压人民群众,维护其**“呼喇喇似大厦倾”**的反动统治。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外国侵略者深感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仅靠他们自己有洋枪洋炮还不行,还必须**“加强清政府的力量”**,把清政府变成他们的得力走狗,必须把中国的大地主、大官僚造成洋奴买办,必须在中国培植洋奴思想。为此,他们在竭力向中国兜售白种人种族**“优越”**的谬论的同时,力劝清政府**“以中国之声名文物(即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向他们**“借法自强”**,**“约外人相帮”**

“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厂矿,操练水陆各军。于是,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地主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而相互勾结起来。并且在外国侵略者这种**“外人相帮”**下,在中国造成了一批洋奴买办,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三位一体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就是他们的代表。洋奴哲学,也正是在这种**“外人相帮”**下,由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奴化思想和中国的孔孟之道相结合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体现了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甘当洋奴的反革命阶级性。

洋奴哲学,还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性。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坚船利炮”**上面。张之洞认为,**“坚船利炮”**乃清王朝**“安身立命之端”**,能使**“乱民无抗拒之资,宵小弭孽芽之渐”**。这当然是一

种幻想。但是，任何反动派在其快被群众革命的怒涛吞没时，总是把某种新式武器当作救命稻草，腐朽反动的地主阶级也不例外。由于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落后的，它自身的力量是虚弱的。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不允许新生产力发展，力量虚弱的地主阶级离开洋大人连一点小事也办不成。因此，要取得“坚船利炮”，唯一的途径，只有把立足点放在依赖洋人的基础上，或者直接向洋人乞求，或者借洋债，雇洋匠，向洋人“觅制器之器”，在技术上照着洋人的葫芦画瓢，赖洋人之力，把现代生产资料硬塞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框框里，来制造“坚船利炮”。

洋奴哲学，也是同没落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世界观一致的。他们是死抱住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把中国劳动人民视为“下愚”，把自己视为“上智”，洋人是他们的主子，自然更是“超级上智”。洋人那里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要办能够制造“坚船利炮”的实业，还能不依赖洋人么！

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三位一体的张之洞和曾国藩、李鸿章一伙，挂着“自强要政”的幌子，在“外人相帮”下，奉行洋奴哲学、大办洋务运动的几十年，实质上是他们出卖主权、投降卖国、加速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几十年。历史彻底揭穿了他们所推行的洋奴哲学和洋务运动的反动实质，宣告了洋奴哲学和洋务运动的破产，张之洞和曾国藩、李鸿章这伙罪大恶极的卖国贼，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洋奴哲学并未绝种，张之洞一伙后继有人，从袁世凯、蒋介石到刘少奇、林彪，都是洋奴哲学的奉行着。刘少奇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林彪要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下搞所谓“民富国强”。这些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奉行洋奴哲学，崇洋媚外，都是为着反革命的目的。所不同的是，张之洞之流是妄图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和加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刘少奇、林彪一伙则是梦想依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反动派也扭转不了的，他们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必然被碾得粉身碎骨。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深入批判形形色色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彻底肃清其流毒，将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自觉地永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